

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 国家的政党外交研究

高 灿

摘要: 越共十一大以来,政党外交在越南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作用愈显突出。因为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相同,社会主义国家历来都是越南政党外交的重点方向。纵观越南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整个实践历程,按照重大事件或时间节点可以将其划分为初步探索期、重要调整期、巩固充实期及成熟稳定期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政党外交都有不同的具体表现,但为国家利益服务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始终是每个时代鲜明的特征。越共十一大是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与以往党代会单纯强调融入国际经济有所不同,这次党代会突出强调了“积极、主动融入国际”。因此,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的政党外交以其灵活且颇具潜力的优势,日益受到越共的重视。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更趋成熟稳定,呈现出广层级、多形式、高政治的特点,且相较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越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在外交的内容、形式、对象等方面特点显著。展望未来,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在越南总体外交中的独特优势将进一步得到发挥,且日益朝着体制机制化的方向迈进,将为维护越南国家利益和政治安全提供更大助力。

关键词: 越共十一大;越南外交;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共产党;政党外交

收稿日期: 2024—09—03

作者简介: 高灿(1995—),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越南研究所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领域:越南政党政治。

2011年召开的越共十一大是越南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在此次大会上，阮富仲被选举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同时，与以往党代会强调融入国际经济不同的是，这次代表大会有关外交工作的表述中出现了“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的字样。^①此后，在越共十二大及十三大也出现了类似表述，这表明越南外交的目标是在各领域、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越共十一大以来政党外交在越南全方位总体外交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越共十三大更是明确提出在推进政治安全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三大支柱”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构建政党外交、国家外交和人民外交“新三大支柱”。^②作为越南外交重点方向且同为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就成为政党外交开展的重要方向。对此，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曾表示，要发挥政党外交在促进越南与周边国家，特别是社会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关系在总体战略中的作用。^③基于此，研究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对研究越南总体外交、越南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党外交的概念界定

最先出现政党并将政党运用在国家政治及外交生活中的是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政党发展壮大，政党外交在这些国家的外交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但西方国家却并未首先提出政党外交这一概念。中国学者围绕实施主体、被实施对象、方式手段及目标等几个方面对政党外交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争议较大的点在于政党外交的实施主体和被实施对象是否要具备合法性。

围绕着上述问题，当前学术界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政党外交的实施主体和被实施对象均要具备合法性，如周余云认为政党外交是“作为主权国家合法政党之间开展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④二是认为政党外交的实施主体要具备合法性，而被实施对象

① 刘刚：《越共十一大描绘未来10年现代化建设蓝图》，《人民日报》，2011年1月13日，第21版。

② 贺钦：《从2021年党代会看社会主义四国新动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年第4期，第101页。

③ 马勇、贾超芝杉：《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外交新动向》，《社会主义论坛》，2022年第5期，第52页。

④ 周余云：《论政党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7期，第17页。

不一定要具备合法性，目前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相对较多。例如，刘朋认为政党外交是“执政党或参政党在为特定的目的而斗争的过程中，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各种类型的政党进行交往、合作和斗争的政治行为”^①；许月梅认为政党外交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为特定的目的而斗争的过程中，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各种类型的政党进行交往、合作和斗争的政治行为”^②；王福春认为政党外交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际联络工作或党的外事工作”^③；余科杰认为政党外交是“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指导下，一国之合法政党与外国政党或政党国际组织，为促进或影响国家关系、维护本国利益而进行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④。三是认为政党外交的实施主体可以不具备合法性，而被实施对象要具备合法性。如王创峰认为政党外交是“一种广义上的外交行为，是指一国政党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指导下，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家关系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及政党国际组织进行的联系和交往”^⑤。四是认为政党外交的实施主体和被实施对象均不一定要具备合法性，如罗建波认为政党外交是“一国政党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家关系而与他国政党及政党组织进行的交往与联系”^⑥。

要想对政党外交进行系统全面的解释，仍然要回到外交这一更广层级的概念上来。政党外交本质上是外交的众多形式之一，它应该体现国家意志，并为国家利益服务，而非法政党无法体现国家意志，更不能代表国家，其对外政党交往活动显然无法称之为政党外交。另外，外交的相关定义，主要强调合法主体的对外交往活动，并未突出交往对象的合法性与否，因而政党外交的被实施对象也就不能将非法政党排除在外。同时，在政党外交的实施主体要具备合法性，而被实施对象不一定要具备合法性这种观点中，将政党外交的实施主体限定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范围内未免过于狭窄，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或体现执政党意志、被执政党授权或允许的政党对其他国家政党及政党国际组织的外交活动显然也符合主体要具备合法性的要求，而在政党外

① 刘朋：《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现状与思考》，《学术探索》，2010年第2期，第49页。

② 许月梅：《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③ 王福春：《外事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④ 余科杰：《论“政党外交”的起源和发展——基于词源概念的梳理考察》，《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第125页。

⑤ 王创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8页。

⑥ 罗建波：《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百年探索》，《西亚非洲》，2021年第3期，第4页。

交的定义中出现“为特定的目的而斗争的过程”这种表述也显然忽视了政党外交本身所具有的促进党和国家间关系及合作的功能。综合以上观点，政党外交可被定义为“在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指导下，一国之合法政党与外国政党或政党国际组织，为促进或影响国家关系、维护本国利益而进行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则是，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权的正式确立，开启了社会主义政党对外交往迈向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先河。^①

进一步加深理解政党外交，还需区分清楚政党外交和党际交往这一相近概念。党际交往是指“一国政党与外国政党或政党国际组织进行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两者较为明显的区别在于：一是政党外交在处理党际关系的过程中，强调党际关系服务于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功能作用，而以党际关系来概括的国际间政党交往则并不强调这一功能；^②二是政党外交与党际交往相比，政党外交的主体必须是合法政党，而党际交往则可包括非法政党，政党外交看似发展范围受到了限制，但实际上却更能体现国家意志和代表国家利益，具有党际交往难以比拟的深度，影响的范围也能够随之不断扩大，政党外交可以同政府外交、议会外交、经济外交、民间外交相互配合，相辅相成。^③

越南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国家，且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唯一的合法政党，因而越南政党外交的主体无疑是越南共产党。此外，由于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均为共产主义政党执政，且共产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中，老挝和古巴国内只有老挝人民革命党和古巴共产党一个政党），因而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主要是指越南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即共产主义政党的交流、对话与合作。

二、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实践历程

纵观整个越南共产党的外交史，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实践历程已有近80年时间，时间轴线贯穿了越南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越南共产党成为正式的执政党以前，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联系和交往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政党外交，只能称为党际交往。

^① 杨修文、陈海燕：《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发展创新及其经验启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7期，第50页。

^② 余科杰：《关于政党外交研究的若干思考》，《新视野》，2018年第1期，第118页。

^③ 吴兴唐：《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新时期》，《当代世界》，2009年第2期，第16—17页。

1945年越南共产党(时称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八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由此成为执政党。^①随后,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正式拉开帷幕。从1945年越南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实践历程来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和特征,但维护国家利益和政治安全始终是各个阶段最重要的目标。

(一) 初步探索期: 1945—1976年

1976年以前是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初步探索期,这一时期的越南政党外交刚刚起步。鉴于中苏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越南在这一时期积极探索通过意识形态纽带,发挥政党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越南总体外交大局。

越南共产党诞生于越南抗法战争时期,于1930年在香港九龙正式成立,后在1945年成为执政党。在越南反抗殖民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期间,越南共产党几度更名,先后称为越南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等,1976年越南完成统一之后正式定名为越南共产党。^②实际上,在越南共产党成立前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早期领导人就曾与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络。1924年,胡志明在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30年,在中共广东省委的帮助下,越南共产党成立。^③1945年,越南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但直到1950年越南共产党与中苏等国共产党的联系还不是十分密切。^④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加速了越南共产党与中苏等国共产党的接触步伐,1950年初越南分别与中苏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二战后初期,成为执政党的越南共产党并未带领越南人民彻底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美国也想将越南纳入其势力范围,殖民者扶植的傀儡政权对越南共产党的生存及安全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中苏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越南共产党的重要倚靠。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通过频繁的政党

^① 于洪君:《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不同成因与历史命运》,《当代世界》,2015年第1期,第20页。

^② 杜继锋:《越南共产党:现状与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0期,第95页。

^③ 李家忠:《胡志明传奇的一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203页。

^④ Christopher E. Goscha, “Courting Diplomatic Disaster? The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Vietnam into the 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Movement (1945-1950)”,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Vol.1, No.1-2, 2006, p.60.

外交争取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

中越两国建交后不久的1950年初,越共(时称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秘密访华,向中共中央提出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也表达了希望中共中央派遣军事顾问团赴越的请求。^①1955年6月,越共(时称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率团首次正式访问中国,此后,胡志明、黎笋等越共主要领导人多次率团来华访问,希望增加军事、经济援助。其中,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在率团访华期间更是请求中共中央派遣支援部队开赴越南。^②通过一系列对华政党外交,越南获得了中国超过200多亿美元的援助物资和30多万人民解放军赴越支援作战,有力地支援了越南独立斗争。^③

1950年初,胡志明秘密访问苏联。^④1955年6—7月,胡志明率团正式出访苏联,并得到了苏联提供的大量经济援助。1956年初,越南劳动党主要领导人长征和黎德寿率领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1957年11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率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66年3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率领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届代表大会。1975年10月,黎笋率团访苏,双方签订了《越苏宣言》。^⑤通过一系列的对苏政党外交,越南不仅获得了苏联巨额的经济及军事援助,也把越苏两党两国关系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此外,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主要领导人还在这一时期出访了蒙古、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与这些国家的党际和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越南在一系列政党外交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越南通过频繁的政党外交获得了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宝贵的政治支持和巨额的经济、军事援助。1976年,越南正式实现统一,改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二) 重要调整期: 1977—1991年

1977—1991年是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的重要调整期,越南与中老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际和国家间关系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和调整。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越南通过一系列政党外交

① 李家忠:《胡志明传奇的一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203页。

② 徐绍丽、利国、张训常:《越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367页。

③ 禄德安:《中国对越南抗法、抗美斗争的援助》,《世界知识》,2011年第14期,第23页。

④ 张明金:《刘少奇与援越抗法战争(上)》,《党史博览》,2024年第9期,第13—18页。

⑤ 王士录等:《当代越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页。

对与中国、老挝、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际及国家间关系进行修复或调整，最终与中老两国党际和国家间关系实现正常化或走向平等化，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党际和国家间关系也因为形势的重大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统一后的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野心不断膨胀，不仅加大了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老挝的政治、经济、军事控制，更是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及重要邻国柬埔寨发生了军事冲突，意在实现其称霸印支地区的战略目标。这导致越南与中国关系彻底破裂，与东盟各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①越南认为中国因为越苏强化关系而试图对越南施压，将中国视为其向印度支那地区扩张的重大阻碍。^②越南统一后不久便开始大规模反华排华，并不断侵扰中越边界，造成大量的中国无辜边民死伤，中国政府被迫对越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越两党两国关系跌入历史冰点，并开始了长达10年的边境冲突。^③在反华排华的同时，越南还加强了对老挝的控制，并直接出兵柬埔寨，严重影响了地区和平与稳定。1977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率团出访老挝，双方缔结了《越老友好合作条约》，确认了越老“特殊关系”。1986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率团出访老挝，重申了两国的特殊关系。^④1978年12月，越南出兵柬埔寨，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越柬战争，进一步引发了地区局势的动荡。^⑤在出兵柬埔寨后，越南要求老挝表明对越南的支持态度，这也导致了中老关系的严重恶化并且直到中越关系松动前长期未得到恢复。^⑥

在此形势下，越南积极寻求强有力的外援和帮手。由于与中美等国交恶，苏联无疑成为越南这一时期的唯一可选对象，因此越南通过一系列政党外交强化了与苏联的关系。1978年11月，越共主要领导人黎笋、范文同率团访苏，越苏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越苏友好合作条约》。1981年6月和9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两次率团访苏，双方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1982年10月和11月，越共领导人长征两次率团访苏。1985年6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率团访苏，并与新任

① 林明华：《新时期越南外交》，《当代亚太》，2003年第3期，第31页。

② David G. Marr,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6, 1981, p. 61.

③ 宫力：《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中的美中苏三角关系》，《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第67—69页。

④ 王士录等：《当代越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⑤ 潘蓓英：《柬埔寨问题的症结与出路》，《外交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第32页。

⑥ Martin Stuart-Fox, “LAOS: The Vietnamese Connectio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80, p.192.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谈。^①据统计,仅在1978—1984年间,越南就从苏联获得了约13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②这一时期,越南已完全将苏联视为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石。^③

虽然暂时得到了苏联等国家的支持,但越南的扩张政策终究不得人心,从1978年到1990年的十几年间越南不仅每年要为其扩张政策负担巨额的经济及军事开支,还要面临国际舆论的谴责。除了在越南掌控之下的老挝、柬埔寨两国和同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苏联、东欧等少数国家外,越南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④后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也深深触动了越南,使得越南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性。^⑤迫于国内外压力,越南不得不进行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其中对中老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际及国家间关系调整被列为重中之重。经过一系列的外交努力,越南最终在1991年前与中老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实现正常化。1990年9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率团在成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会谈,就推动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重要共识。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率团正式访问中国,标志着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⑥在1991年6月召开的越共七大上,越共中央表态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越老两党两国关系。此后,越南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老挝的控制,越老两党两国关系也做了重大调整。

除了与中老两国实现党际及国家间关系的重大调整外,这一时期越南与苏联、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际和国家间关系也因形势的重大变化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1年,苏联解体,国家性质发生改变,苏共的执政党地位不复存在。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得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性质发生改变,结束了这些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越南与这些国家间的党际和国家间关系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① 王士录等:《当代越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218页。

② 同上,第217页。

③ Carlyle Thayer, *Vietnamese Diplomacy, 1975-2015: from Member of the Socialist Camp to Proactive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Presentation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etnam, April 25, 2015, p.3.

④ 林明华:《新时期越南外交》,《当代亚太》,2003年第3期,第31页。

⑤ Alexander L. Vuving, *The Evolution of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Doi Moi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13.

⑥ 古小松:《越南历史 国情 前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0页。

（三）巩固充实期：1992—2010年

1992—2010年是越南对新老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巩固充实期，越南通过频繁的政党外交巩固和发展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友谊，政治互信明显增强，从而为越南革新开放事业的全面铺开营造了更加和平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

随着苏联解体，对华政党外交也就成为这一时期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重中之重。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在1991年彻底实现正常化以后，越共高层通过一系列政党外交持续巩固两党两国关系成果，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共高层的对华政党外交更加频繁。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于1995年和1997年先后两次来华访问，进一步巩固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1999年2—3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确定了新世纪两国“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关系框架。^①进入21世纪以来，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四度访华（2001年、2003年、2006年和2008年），每次访华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进行了会谈，就加强和发展中越传统友谊及推动中越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向前发展达成重要共识。^②其中，2008年5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来华访问期间，中越两国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③此外，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英、潘文凯、陈德良、阮明哲等人也曾多次率团来华访问，与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就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进行了多次的坦诚沟通，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两党首次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④此后，理论研讨会逐渐成为两党固定的交流机制，在两国轮流举办。

除对华进行频繁的政党外交外，越共高层还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政党外交，以巩固和发展党际和国家间关系。1998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出任总书记后首访老挝，借以体现越老“特殊

^① 于向东：《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的全面发展及其展望》，《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83页。

^② 《中国同越南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年7月3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sbgx_677296/。

^③ 同上。

^④ 韦日平：《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亮点》，《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43—144页。

关系”。^① 2007年6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问古巴，推动越古两党两国关系向前发展。^② 2007年10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问朝鲜，这是50年来越共中央总书记首次访问朝鲜，对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③

（四）成熟稳定期：2011年至今

2011年至今是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成熟稳定期，越南与中老等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党际和国家间关系在这一时期更趋成熟和稳定。越南通过频繁的政党外交持续深化与中老等社会主义国家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与中老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际和国家间关系全面发展，并在传统友谊与战略关系的基础上注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元素。

2011年召开的越共十一大，选举阮富仲为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总书记执政风格总体比较稳定务实，对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党际和国家间关系十分重视，在其任内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了更为频繁的政党外交。阮富仲总书记多次率团访华，使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特别是对华政党外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2024年7月19日，阮富仲总书记因病去世，同年8月3日，苏林接任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总书记基本延续了阮富仲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视态度，积极推动与中老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国家间关系全面发展。

2011年10月，上任不到一年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以越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来华访问。^④ 2015年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以越共最高领导人身份再次访华，同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回访，实现了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年内互访。2017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年初访华，同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回访，实现了短短两年间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再次互访。2022年10月，阮富仲第四次访华，次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越南进行回访，两党最高领导人完成了第三次互访，并在这次会面中提出了构建具有

① 徐绍丽、利国、张训常：《越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页。

② 《卡斯特罗会见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农德孟》，央视网，2007年6月3日，<https://news.cctv.com/world/20070603/101402.shtml>。

③ 《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访问朝鲜》，央视网，2007年10月17日，<https://news.cctv.com/world/20071017/103407.shtml>。

④ 《中国同越南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年7月3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sbgx_677296/。

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① 2024年8月,苏林担任新一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仅半月时间便将任后首访定在中国,两党领导人就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②

除对华进行频繁的政党外交外,越南也十分重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阮富仲总书记多次出访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苏林也在接任越共总书记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访问古巴,积极发挥了政党外交中的元首引领作用。2011年6月,阮富仲首次以越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访问老挝。^③ 2016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再次访问老挝,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沃拉吉进行会谈。^④ 2019年2月,阮富仲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身份访问老挝,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沃拉吉就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达成了重要共识。^⑤ 2012年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古巴,开始了他就任总书记以来对古巴的首次出访。^⑥ 2018年3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再次访问古巴,进一步赓续了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⑦ 2024年9月,苏林在接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便访问古巴,成为继中国之后其访问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彰显出越南与古巴的传统团结和特殊友谊。^⑧ 此外,越共最高领导人虽然在这一时期还未对朝鲜进行访问,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应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邀请

① 《中国同越南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年7月3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sbgx_677296/。

②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访华开启了中越关系新篇章》,越南人民报网,2024年8月21日,<https://cn.nhandan.vn/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访华开启了中越关系新篇章-post127254.html>。

③ 《总书记、国会主席阮富仲访问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11年6月14日,<https://cn.baochinhphu.vn/总书记、国会主席阮富仲访问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1164367.htm>。

④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老挝:进一步加强越老两国特殊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越南通讯社网,2016年11月19日,<https://zh.vietnamplus.vn/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老挝:进一步加强越老两国特殊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post58246.vnp>。

⑤ 《越老联合声明:两国永远在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道路上携手前行》,越南通讯社网,2019年2月25日,<https://zh.vietnamplus.vn/越老联合声明:两国永远在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道路上携手前行-post92422.vnp>。

⑥ 《进一步加强越南—古巴全面合作关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12年4月10日,<https://cn.baochinhphu.vn/进一步加强越南—古巴全面合作关系-1167152.htm>。

⑦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古巴标志着两国关系迈进重大一步》,越南通讯社网,2018年3月26日,<https://zh.vietnamplus.vn/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古巴标志着两国关系迈进重大一步-post78182.vnp>。

⑧ 《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对古巴的访问开启了两国特殊友好合作关系新阶段》,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24年9月22日,<https://cn.baochinhphu.vn/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对古巴的访问开启了两国特殊友好合作关系新阶段-116240922233247924.htm>。

于2019年2—3月访问了越南。^①这是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人时隔55年后再次访问越南，此访对于两党两国关系意义重大。

三、越共十一大以来对社会主义 国家政党外交的发展变化

越共十一大以前，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总体呈现出交往层级过于重视高层、交往形式相对单一、交往内容较少涉及高政治议题等特点，而越共十一大以后则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一）与越共十一大以前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相比， 十一大以后向广层级、多形式、高政治方向迈进

一是广层级。越共十一大以前，越南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的实践过程中过于重视高层的引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的作用，而这一情况在越共十一大以后明显得到了改善。在2008年5—6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华期间，双方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点提及了建立两党中央部门的交流合作机制，但却没有涉及两党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的具体内容。在2015年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明确提及了深化两党地方特别是接壤各省（区）党组织间的交流合作。在2024年8月苏林总书记访华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更是在深化两党地方特别是接壤各省（区）党组织间的交流合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着重强调了提高两国地方特别是接壤省（区）党组织的合作成效。

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除了继续重视发挥高层的引领作用外，还较为重视地方党组织的交流合作，基本做到了两者兼顾。

从高层引领来看，越共高层特别是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本人在10余年间以越共最高领导人身份多次出访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发挥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中的高层引领作用。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任期内4次访华、3次访老、2次访古，苏林接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将首访定在中国，并在不久后又访问了古巴。

除了越共最高领导人率团频繁访问社会主义国家外，越共其他高

^① 《越朝两党、两国关系史上新的重要里程碑》，越南共产党电子报网，2019年3月1日，<https://cn.dangcongsan.vn/cate-3085/article-514940.html>。

层也频繁出访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将发展中越关系作为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对华政党外交是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的重中之重。截至2024年，十一大以来的越共高级代表团对华访问达到近百次之多。2024年6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阮仲义率领越共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①越南始终将越老伟大友谊、特殊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摆在最优先地位，因此对老挝的政党外交也格外频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仅次于中国。2018年10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率团对老挝进行正式访问，并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沃拉吉。^②越南与古巴两国是传统团结、特殊友谊和全面合作关系，越南对古巴的政党外交也较为频繁。2023年8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阮仲义率领越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会见了古共高层。^③越南对朝鲜的政党外交虽然不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频繁，但因为传统友谊的加持仍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沟通。2015年10月，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民运部部长何氏洁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对朝鲜进行访问并出席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庆祝典礼。^④

越共十一大以来，在积极发挥高层引领作用的同时，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中地方党组织层面的交流合作也日益深入。例如，2023年2月，越共高平、谅山、广宁及河江四省省委书记与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以线上视频的方式举行新春会晤。^⑤2024年8月，越共广平省委书记武大胜与老挝人民革命党沙湾拿吉省委书记邦乔姆·乌邦帕修斯（Bounchom Oubonpaseuth）在沙湾拿吉省进行会谈，达成合作共识。^⑥在越共十一大以前，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中的地方党组织交往中，多为固定访问时的会晤，并未形成稳定机制，十一大以后则快速朝着体制机制化迈进。例如，2016年，中共广西壮

① 《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越南通讯社网，2024年6月14日，<https://zh.vietnamplus.vn/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post218788.vnp>。

② 《进一步推动越老特殊团结关系纵深发展》，越南共产党电子报网，2018年10月9日，<https://cn.dangcongson.vn/cate-3085/article-500739.html>。

③ 《越南与古巴加强思想宣教工作合作》，越南通讯社网，2023年8月24日，<https://zh.vietnamplus.vn/越南与古巴加强思想宣教工作合作-post200199.vnp>。

④ 《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对朝鲜进行访问》，越南通讯社网，2015年10月12日，<https://zh.vietnamplus.vn/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对朝鲜进行访问-post43275.vnp>。

⑤ 《越南边境四省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举行2023年党委书记新春会晤》，越南人民报网，2023年2月23日，<https://cn.nhandan.vn/越南边境四省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举行2023年党委书记新春会晤-post109166.html>。

⑥ 《促进越南广平省与老挝沙湾拿吉省之间的合作》，越南人民报网，2024年8月30日，<https://cn.nhandan.vn/促进越南广平省与老挝沙湾拿吉省之间的合作-post127617.html>。

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与越南高平、谅山、广宁及河江四省省委书记第一次新春会晤成功举行，此后形成年度固定会晤机制。2021年，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与越共老街、河江、莱州、奠边四省省委书记年度会晤机制第一次会议成功举行，此后也形成年度固定会晤机制。

二是多形式。越共十一大以前，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外交形式多局限于各层级访问、理论研讨、高层通话、致电（信）等少数合作交流形式。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中注重扩大各层级交往的同时，也积极和这些传统友好国家探索合作形式的创新。越共十一大后，逐渐探索出表彰有关人员、年度会晤、专题研讨等新的合作交流形式，也对各层级访问、理论研讨、高层通话、致电（信）等越共十一大以前的常用形式有了全新的丰富和发展。目前，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各层级访问、理论研讨、干部联合培训、高层通话、视频会谈、致电（信）、派遣特使、专题研讨、通报国内重大事件、表彰有关人员、年度会晤、多边场合交流会见等。

越共十一大以后，各层级访问在十一大以前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和扩大了良好发展势头。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其任期内的2011年、2015年、2017年及2022年的4次访华，并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多次会晤。

在理论研讨方面，越共十一大以前，越南只与中国存在两党之间的理论研讨机制。越共十一大以后，越南已经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中国、老挝、古巴三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理论研讨机制。截至2024年，越南已经与中国举办了18次两党理论研讨会，和老挝、古巴也分别举办了10次和5次两党理论研讨会。

在干部联合培训方面，越共十一大以前越南多为干部培训的受训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50—1975年中国为越南培训了数以万计的军事政治干部和战后重建人才。^①越共十一大以后，越南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干部培训中展现出了积极姿态，在干部培训中重视发挥联合培训的作用。中越两党达成的《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干部合作培训计划（2021—2025年）》、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举行的“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2016—2021年干部教育培训”等都是越南与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开展干部培养的典型案列。

越共高层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高层领导人始终保持着各种形式的交流与沟通，中越自2008年就开通了两党最高领导

^① 刘文决：《1950—1975年中越两国政府在培训越南》，《南都学坛》，2021年第1期，第30页。

人热线电话，越南与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也开通了热线电话。在越共十一大以后，高层通话在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2021年9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通电话，就疫情背景下的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进行深入交流。^①又如，2022年12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与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Miguel Díaz-Canel Bermudez）通话，充分体现出越古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始终团结、特殊的友谊关系。^②

在越共十一大以前，由于信息技术手段限制及线上会晤效果相对有限等原因，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中领导人会晤多以线下方式进行，极少涉及线上会晤。越共十一大以后，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等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视频会谈以其相对便捷和灵活的优势在越共十一大后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2021年12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陈锦绣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书记、国家监察总署署长坎潘举行视频会谈。^③又如，2023年3月，越共中央委员、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同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埃米利·罗萨达·加西亚（Emilio Lozada Garcia）举行视频会晤。^④

每逢重大事件或重要时间节点致电（信）是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重要形式，特别是越共十一以后这种形式已经成为相对稳定的机制。例如，2021年1月，越共中央委员会向朝鲜劳动党第8次代表大会发出贺电，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发出贺电。^⑤2022年3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建党67周年之际，越

① 《中国同越南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年7月3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sbgx_677296/。

②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与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国家主席通电话》，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22年12月23日，<https://cn.baochinhphu.vn/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与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国家主席通电话-116221223093656723.htm>。

③ 《越老两党就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进行视频会谈》，越南通讯社网，2021年12月8日，<https://zh.vietnamplus.vn/越老两党就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进行视频会谈-post154031.vnp>。

④ 《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与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罗萨达举行视频会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23年3月2日，<https://cn.baochinhphu.vn/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与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罗萨达举行视频会晤-116230302124636984.htm>。

⑤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致贺电》，越南通讯社网，2021年1月11日，<https://zh.vietnamplus.vn/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致贺电-post133725.vnp>。

共中央委员会向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发出贺电。^①

越共十一大以来,在本国或社会主义友好国家举办党代会等重大活动及两党两国在涉及彼此重大利益问题上需要沟通时,派遣特使这一形式在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中得到广泛应用。2014年8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特使、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黎鸿英应邀访华,双方就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达成一定共识。^②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特使、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在北京转交了阮富仲总书记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并转达口信。^③

越共十一大以前,越南只与中国形成了两党理论研讨会这一关于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合作的稳定机制。十一大以后,开展专题研讨逐渐成为除理论学习外探索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合作的又一重要形式。2021年9月,越共中央对外部、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暨越中两党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专题研讨会在线举行。^④2023年8月,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阮仲义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同古巴共产党联合举行了胡志明主席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对越古兄弟般情谊做出的贡献研讨会。^⑤

每逢党代会等国内重大事件向社会主义友好国家进行通报已经成为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中较为稳定的形式,越共十一大以后这种形式得到进一步稳固。2021年4月,越共中央委员、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会副主席、中央对外部部长顺通·赛雅佳共同主持越南共产党与老挝人民革命党视频会议,就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果进行通报和讨论。^⑥

① 《越共中央委员会致电祝贺老挝人民革命党建党67周年》,越南通讯社网,2022年3月21日, <https://zh.vietnamplus.vn/> 越共中央委员会致电祝贺老挝人民革命党建党67周年 -post160860.vnp。

② 余科杰:《二十大以后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外交评论》,2023年第3期,第15页。

③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特使》,越南通讯社网,2017年10月30日, <https://zh.vietnamplus.vn/>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特使 -post72094.vnp。

④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暨越中两党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专题研讨会在线举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2021年9月29日, <https://cn.baochinhphu.vn/>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暨越中两党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专题研讨会在线举行 -11635659.htm。

⑤ 《胡志明主席和菲德尔·卡斯特罗领袖对越古关系做出的贡献研讨会举行》,越南通讯社网,2023年8月24日, <https://zh.vietnamplus.vn/> 胡志明主席和菲德尔·卡斯特罗领袖对越古关系做出的贡献研讨会举行 -post200252.vnp。

⑥ 《越南共产党与老挝人民革命党视频会议召开》,越南通讯社网,2021年4月1日, <https://zh.vietnamplus.vn/> 越南共产党与老挝人民革命党视频会议召开 -post137354.vnp。

2021年4月，越共中央委员、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向中国共产党通报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果。^①

表彰有功人员是越共十一大以后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中一种新的形式，它丰富了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形式和内涵。2018年2月，越老建交55周年和《越老友好合作条约》签字40周年之际，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陈大光向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部17名工作人员授予三等独立勋章和友谊勋章，对他们在促进越老传统友谊、特殊团结与全面合作关系所作出的贡献给予表彰。^②

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与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党的对外、宣传、地方等部门年度会晤这一创新性机制，目前年度会晤已经成为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重要机制。2024年3月，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到访吉林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共同主持中越两党对外部门年度会晤。^③

多边场合交流会见也是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重要形式，这一形式虽然在越共十一大以前已然有之，但在越共十一大以后在多边交流会见的平台和机制方面实现了巨大的突破和发展。2021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率领越南共产党高级代表团以视频方式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④

三是高政治。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

加强政治安全合作是越南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越南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外部依靠。越共十一大以前，越南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不乏政治安全合作的内容，但多为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为维护越南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为其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军事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美西方势力渗透，愈发需要加强

① 《越南外交部就向中国共产党通报关于越共十三大结果举行视频会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21年4月13日，<https://cn.baochinhphu.vn/>越南外交部就向中国共产党通报关于越共十三大结果举行视频会议-11634358.htm。

② 《越南向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部工作人员授予勋章和徽章》，越南通讯社网，2018年2月4日，<https://zh.vietnamplus.vn/>越南向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部工作人员授予勋章和徽章-post76348.vnp。

③ 《刘建超同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举行会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2024年3月18日，<https://www.idpc.gov.cn/was5/web/search>。

④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21年7月7日，<https://cn.baochinhphu.vn/>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11634933.htm。

团结合作，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对该领域的合作也更加重视，在越共领导人对社会主義国家的多次访问中，都着重提到了相关内容。例如，2019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老挝期间，双方的联合声明中着重提到了加强两国国防安全合作、维护两国政治安全的内容。^① 2022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联合声明中也明确提到，同意深化政治安全合作，抵御“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② 2024年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联合声明中也涉及双方就反干涉、反分裂、防范“颜色革命”等加强信息交流和经验共享，共同维护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的内容。^③ 由此可见，随着与中老等社会主义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的深入，越南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中对加强政治安全合作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合作的内容与形式都在不断拓展和完善。

核心利益是一个国家不容侵犯的底线，特别是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美西方日趋激烈的打压，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需求日益迫切。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在涉及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核心利益的议题上，给予了对方更为明确的支持。例如，在2024年苏林总书记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联合声明中，越南明确表示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认为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是中国内政。^④ 在美西方加大对越南拉拢力度及中越关系因南海问题偶有摩擦的背景下，越南也并未公开动摇这一立场。例如，在2024年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访问古巴与古共最高领导人会谈时，苏林表示越南一贯主张团结和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要求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和禁运，并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删除。^⑤ 对涉及古巴核心利益的安全与发展问题表现出了坚定的支持，并以捐赠大米和电脑的

① 《越老联合声明：两国永远在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道路上携手前行》，越南通讯社网，2019年2月25日，<https://zh.vietnamplus.vn/> 越老联合声明：两国永远在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道路上携手前行 -post92422.vnp。

②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年11月2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11/t20221102_10795594.shtml。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年8月20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408/t20240820_11477050.shtml。

④ 同上。

⑤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与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举行会谈》，越南通讯社网，2024年9月27日，<https://zh.vietnamplus.vn/>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与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举行会谈 -post225561.vnp。

实际行动为正在面临美西方封锁的古巴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近几年来，越南在处理南海争端时更趋低调，在两党最高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充分体现了双方不回避矛盾、谋求和平解决的共识。例如，2022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期间表示，越南同意继续恪守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管控好海上分歧，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① 2024年苏林总书记访华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到，越方同意与中方更好地管控和积极解决海上分歧，维护南海和平稳定。^②

（二）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相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有着难以比拟的深度与广度

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具有一些共同点，形式都包括高层或代表团出访、视频会晤或通话、理论对话、致贺电（信）等，内容也涉及党际及国家间事务方面，但仍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处。

一是与资本主义国家非共产主义政党相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形式更加多样、涉及党际及国家间关系的内容更为均衡，而对资本主义国家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外交形式相对单一、内容更侧重于国家事务层面。

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形式涵盖各层级访问、理论研讨、联合干部培训、高层通话、视频会谈、致电（信）、派遣特使、专题研讨、通报国内重大事件、表彰有关人员、年度会晤、多边场合交流会见等至少10余种，且大多实现了体制机制化或正在向体制机制化迈进。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相比，越南对资本主义国家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外交形式相对单一，主要包括高层或代表团出访、视频会晤或通话、政策及理论对话、致贺电（信）等少数几种。例如，2012年9月，越共中央委员、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对瑞典和丹麦进行工作访问，在访问瑞典和丹麦期间，黄平君一行与瑞典左翼党、社会民主党、温和联合党领导人以及丹麦

^①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年11月2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11/t20221102_10795594.s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年8月20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408/t20240820_11477050.shtml。

社会主义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分别举行会谈。^① 2022年5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院长、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胜为团长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与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施韦策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在柏林举行第7次理论对话。^② 2024年6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向蒙古人民党主席罗布桑那木斯来·奥云额尔登(Luvsannamsrain Oyun-Erdene)致贺电,祝贺蒙古人民党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③ 总体来看,越南对资本主义国家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外交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相比在外交形式上相对单一一些。

另外,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在具体的内容中对党际关系及合作、国家间关系及合作往往都有较深的涉及,基本做到了两者兼顾。例如,在2019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老挝期间,双方在强调加强国防安全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在区域及国际问题上的团结合作的同时,也重点提及了加强两党高层互访、党建工作交流等党际交流合作方面的内容。^④ 2024年苏林总书记访华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既涉及南海问题、防务合作、发展战略对接、文化交流、防灾减灾合作等内容,也有大量篇幅涉及两党友谊、党际合作及两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分享等内容。^⑤ 与越共十一大以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相比,越南对资本主义国家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外交主要内容往往更侧重于国家事务层面,涉及两党关系及两党合作的内容相对较少。这是由于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相比,越南与资本主义国家非共产主义政党缺乏意识形态纽带,政党间的合作机制往往相对较少,因而在实际交流与合作中涉及两国间关系及国家事务层面的内容相对较多。例如,

① 《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对瑞典和丹麦进行工作访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12年9月29日, <https://cn.baochinhphu.vn/> 越南共产党代表团对瑞典和丹麦进行工作访问-1169308.htm。

② 《越南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七次理论对话在柏林举行》,越南通讯社网,2022年5月17日, <https://zh.vietnamplus.vn/> 越南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七次理论对话在柏林举行-post165638.vnp。

③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致电祝贺蒙古人民党主席》,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24年7月11日, <https://cn.baochinhphu.vn/>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致电祝贺蒙古人民党主席-116240711100235647.htm。

④ 《越老联合声明:两国永远在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道路上携手前行》,越南通讯社网,2019年2月25日, <https://zh.vietnamplus.vn/> 越老联合声明:两国永远在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道路上携手前行-post92422.vnp。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年8月20日,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408/t20240820_11477050.shtml。

2015年9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谷垣禎一，双方着重提及携手推动日越纵深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务实、可持续发展，继续推进两国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关系更加纵深全面发展。^① 2018年9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匈牙利期间，在会见匈牙利社会党主席多特·贝尔道兰时，双方重点强调要进一步巩固、提升两国全面合作传统友谊关系，同时携手建立越匈全面合作关系。^② 2024年4月，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忠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负责对外事务的中央委员穆拉德·拉姆迪举行视频会晤期间，着重强调双方通过加强各层级代表团互访、各领域的经验交流来加强合作，发展两国多方面的合作，扩大民间交流，在国际场合上保持配合。^③

二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相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的对象和涉及党际及国家间关系的内容较为均衡，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外交对象多倾向于法日印俄美等国的共产党、内容多集中于两党间关系或为两国关系提供支持和助力。

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老、古三国的政党外交尤为频繁，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越南政党外交的重点实施对象。例如，2024年7月至9月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苏林先后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及越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访问老挝、中国、古巴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中国更是其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对外出访。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对象总体较为均衡相比，越南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外交对象多倾向于法日印俄美等国的共产党。这是由于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频繁的交往，既可以提升越南共产党的地位和威望，同时也能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推动越南与这些国家的国家间关系发展，凝聚更多合作共识。例如，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越日友好议员小组主席张氏梅，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武文赏，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中央理论委员会主任丁世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① 《阮富仲总书记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谷垣禎一》，越南通讯社网，2015年9月17日，<https://zh.vietnamplus.vn/> 阮富仲总书记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谷垣禎一 -post42466.vnp。

②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会见匈牙利社会党主席》，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24年9月5日，<https://cn.baochinhphu.vn/>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会见匈牙利社会党主席 -11628311.htm。

③ 《黎怀忠同志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领导举行线上会谈》，越南人民报网，2024年4月24日，<https://cn.nhandan.vn/> 黎怀忠同志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领导举行线上会 -post123403.html。

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院长阮春胜，越共中央宣教部副部长潘春水，越共中央民运部副部长赵才荣等越共高层在访日期间会见日共高层。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陈大光，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主席王廷惠，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主席阮氏金银，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善仁，永隆省委书记裴文严，富安省委书记黄晋越，广南省委书记阮玉光等越共中央及地方高层在访印期间与印度共产党及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主要领导会谈。2012年越南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举办第一届两党理论研讨会，此后两党理论研讨会成为两党间交流与合作的固定机制，越南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还于2021年12月以线上方式联合举行胡志明主席与法国共产党和马赛市研讨会等。^①2014年6月，约翰·巴切特尔（John Bachtell）在美国共产党第30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主席，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向他发出贺电。^②2023年2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就俄共建党30周年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安德列耶维奇·久加诺夫（Gennady Andreyevich Zyuganov）致贺电。^③

另外，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内容往往注重党际及国家间关系的兼顾，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双方均为国内唯一执政党的地位所决定的。与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外交不同的是，越南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外交在重视传统友谊与意识形态联系的同时，因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并非执政党，因而政党外交的内容往往是集中于党际关系或为两国关系提供支持和助力。2013年6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黎鸿英率团赴乌克兰进行访问，并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皮得·尼古拉耶维奇·西蒙年科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提高两党的合作效益，维持各级代表团互访、加强信息交流和党务工作经验交流，加强对两国年轻一代宣传越乌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④2018年9月访俄期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会见了俄

① 《胡志明主席与法国共产党和马赛市研讨会举行》，越南共产党电子报网，2021年12月7日，<https://cn.dangcongsan.vn/cate-3085/article-588342.html>。

② 《阮富仲总书记致电祝贺约翰·巴切特尔当选美共主席》，越南人民报网，2014年6月17日，<https://cn.nhandan.vn/> 阮富仲总书记致电祝贺约翰·巴切特尔当选美共主席 -post21893.html

③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致电祝贺俄罗斯共产党建党30周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23年2月13日，<https://cn.baochinhphu.vn/>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致电祝贺俄罗斯共产党建党30周年 -116230214103600664.htm。

④ 《越南共产党与乌克兰共产党加强合作》，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新闻网，2013年6月20日，<https://cn.baochinhphu.vn/> 越南共产党与乌克兰共产党加强合作 -11612954.htm。

这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外交大局中，政党外交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共产党与中、朝、老、古四国共产主义政党有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天然亲近感，这为越南与四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深入交往奠定了较为深厚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加之在国家独立战争年代凝结起来的传统友谊，就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这也为政党外交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越南与其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通过频繁的政党外交特别是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晤，能为两党两国关系把舵稳航，使两党两国关系能够按照既定方向平稳健康发展，政党外交在其中显然可以发挥一般外交形式难以比拟的战略作用。此外，与政府外交不同，政党外交形式灵活，可以在处理越南与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分歧中留有一定的转圜余地，便于灵活解决一些通过政府外交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难题，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因政府外交的谈判破裂或失败而使得双边关系陷入彻底失控的境地。例如，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中越南海岛屿争端中，在政府外交难以有效解决争端时，可以通过政党外交的灵活性使两国在谈判和交涉中留有余地，不至于让分歧演变为冲突甚至战争。

（二）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进一步向体制机制化迈进

从目前来看，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已经逐渐趋于成熟稳定，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合作与交流形式已经实现体制机制化，一些形式正在向体制机制化方向迈进，未来这一趋势将明显加快。从理论研讨来看，中越理论研讨会从2003年创立至今，截至2024年已经举办了18次；越老理论研讨会自2014年创立以来，每年一次在越老两国轮流举办，至今已经举办10次；越古两党理论研讨会自2018年首次举办以来，也是每年轮流在越古两国举办，至今已经举办5次。越南与中国、老挝、古巴的两党理论研讨会明显已经实现体制机制化。每逢新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及中、老、朝、古四国党代会等党内重大事件，越共中央及越共高层往往都会第一时间致贺电或贺信，甚至派出特使或代表当面提交贺信或参会；当四国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或党内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士逝世时越共中央及越共高层也会在第一时间致电默哀，甚至派出高级别代表团亲往哀悼。经过多年运转，该形式也正在实现体制机制化。另外，越南党的代表大会和重要党内会议也会在闭

幕后及时向中老等社会主义国家通报情况。此外，党内高层及地方党委领导年度会晤机制也建立并完善起来，在重要时间节点、越南与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矛盾分歧时党内高层通过视频会晤或通话进行沟通协商也逐渐从惯例走向体制机制化。这一切都标志着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正在朝着体制机制化方向迈进，未来将有更多的政党外交形式进一步实现体制机制化。

（三）政党外交将成为越南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制度稳定、抵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

当前，越南国内仍有部分人员或群体对越南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出质疑，从内部对越共的统治形成挑战。^①然而，与这些质疑相比，当前越共统治面临的巨大威胁仍是美西方对越南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制度稳定的冲击。越南和中、朝、老、古四国均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制度稳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越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愈演愈烈，妄图在这些国家中策划“颜色革命”，越南便深受其害。针对越南，美西方国家通过越南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和反动媒体等煽动越南人民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加大向越共高层的渗透力度，妄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越南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面对美西方对越南愈演愈烈的“和平演变”，越南深知加强与中老等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从近几年越南与中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我们几乎都能看到反对外来干涉和抵制“和平演变”的内容，这说明越南与中老等国在共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制度稳定、抵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方面存在着强大的共识。对比2022年与2024年的中越联合声明，不难发现对维护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的相关表述更加全面，对合作方式与手段的规定也更加具体。这表明越南充分意识到在美西方对其愈演愈烈的“和平演变”攻势下，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团结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未来，随着在中越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壮大，美西方在军事及经济手段无法有效遏制的情况下，以“和平演变”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进行颠覆无疑是成本较低的且可行性较高的一种

^① Carlyle Thayer,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Vietnam: Challenge and Response", *Politics & Policy*, Vol. 38, No.3, 2010, pp.423-424.

方式，这也意味着越南将来在与美西方发展政治、经济及军事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将面临着美西方更加猛烈的意识形态颠覆之战。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领域无疑拥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届时越南可通过政党外交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抵御共同威胁，共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制度稳定。

（四）对华政党外交将在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中继续占据着重要位置

当前，中越之间在深化经贸合作、共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也存在着巨大共同利益。总体而言，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也是当前越南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选择推动对华合作的重要动因。对越南而言，中国的重要性和地缘邻近性是其难以忽视的。^①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方面来看，当前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拥有着较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而越南作为当前人口和国土面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中越团结合作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拓展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事实上，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和相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也一直是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黏合剂。^②从经济层面来看，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越南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越南则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越贸易合作潜力巨大，中国经济发展给越南带来的发展机遇是无可估量的。2023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达1719亿美元，2024年预计将达到2000亿美元，^③展现出中越经贸合作迸发出的巨大能量。从政治层面看，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是全球政治格局塑造中的主要力量，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与中国加强务实合作有助于提升越南的国际影响力。从地缘战略层面来看，相较于遥不可及的美国，中国是越南搬不走的邻居，越南大力推进周边外交离不开和中国打交道，只有妥善处理好中越关系，越南才能保证北部边境的和平稳定，甚至能够拥有中国这个实力强大、人口众多且国土广袤的大后方。从军事及安全层面来看，中国军事实力远超越南，无论是维护好国家安全或是越南所谓的“领土完整”，中国始终是绕不开的存在。因此，

^① Alexander L., “Vuving, VIETNAM: A Tale of Four Players”,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March 2010, p.386.

^② Do Thanh Hai, “Vietnam and China: Ideological Bedfellows, Strange Dream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 10, No. 2, 2021, p.164.

^③ 《2024年中越双边贸易额可达2000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4年7月12日，http://vn.mofcom.gov.cn/jmxw/art/2024/art_3f7f7926a7fc4108874defb8c01c9e31.html。

无论是从党际层面，还是国家战略层面，或是利益层面等方面来看，越南对华政党外交都将更加频繁，对华政党外交仍将继续在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五）越南的对华政党外交对深化中越关系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在可预见的未来，越南对华政党外交将更加频繁，而这对深化中越关系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政党外交作为越南总体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南对华政党外交的日渐频繁，可以极大地加深中越之间的政党接触和交往，甚至以此为基础带动中越政府外交、议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各领域外交的务实合作，进而推动中越之间整体外交关系的发展。中越两个执政党的频繁交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凝聚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夯实基础、筑牢根基。另一方面，越南频繁的对华政党外交可以对拓展中国外交局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等多边平台上，越南的积极参与，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示范引领作用，或能吸引更多国家的政党加入其中，使得中国的政党外交及总体外交格局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五、结语

越南共产党在 1945 年取得执政党地位，实现了从党际交往向政党外交的转变。纵观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整个历程，可以将其分为初步探索期、重要调整期、巩固充实期、稳定成熟期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政党外交都有不同的具体表现，但不变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和维护政治安全的一贯性。

从时间序列与横截面分析来看，越共十一大以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相较于十一大以前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都有显著的不同之处。与十一大以前相比，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日益向广层级、多形式、高政治方向迈进，在重视高层引领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发挥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的作用，形式也由十一大以前相对单一的少数几种拓展为涵盖各层级访问、理论研讨、联合干部培训、高层通话、视频会谈、致电（信）、派遣特使、专题研讨、通报国内重大事件、表彰有关人员、年度会晤、多边场合交流会见等在内的多种形式，内容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

全合作、在涉及核心利益领域坚定支持、较为妥善处理海洋和岛屿争端等高政治领域。同时，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相比，对资本主义国家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外交形式相对单一、内容往往更侧重于国家事务层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党外交对象多倾向于法日印俄美等国的共产党、内容多集中于两党间关系或为两国关系提供支持和助力。

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政党外交将在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外交大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解决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些涉及领土和海洋争端方面的议题上，政党外交因其灵活性或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其中，对华政党外交更是重中之重，将在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中继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既是中越传统友谊和相邻的地缘位置作用的结果，更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与影响力及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所决定的。越南日益频繁的对华政党外交，显然也将对深化中越关系及拓展外交局面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经过近80年的政党外交实践，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外交正在快速向体制机制化方向迈进，形成众多相对固定的合作交流形式。另外，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一致性，政党外交也将成为越南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制度稳定、抵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它使得越南在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时能够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支持。

[责任编辑：王国平]